



在当代文学研究传统观念中,“作品即定本”的固有认知长期占据主导,随手拿来的小说往往被视为作家艺术创造的“最终结晶”,是读者阅读与批评家阐释的稳定对象。作家对已面世小说的修改也多被视为创作附属的“技术性修补”,重要作品的版本差异常被忽略为无关宏旨的“文本末节”。然而,真实的文学发生现场和文学史的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许多作家在小说发表后,出于种种原因,会对小说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改写、修订与再版,从而形成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代表作家不同时代(情境)下的文本生产与艺术追求。作家亲身参与的创作与修改行为,使得小说文本不再是静止与封闭的完成品,而是呈现出流动、开放与成长的“活态”特征。拙著《小说变形记: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变迁》(以下简称《小说变形记》)近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借由“版本批评”这一特殊视角,以《白鹿原》《活着》等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变迁为研究切片,通过对经典作品手稿、初刊本、初版本或修订本进行“文学考古”,旨在发掘当代文学文本序列潜在的流动与变异状态,呈现出一种曾被遮蔽的当代文学历史现场。

作家修改小说的多元因由

从文学版本演变历史现场来看,众多名家名作均有过作品修改经历。《这边风景》(王蒙)、《第二次握手》(张扬)、《沉重的翅膀》(张洁)、《芙蓉镇》(古华)、《天堂蒜薹之歌》(莫言)、《活着》(余华)、《白鹿原》(陈忠实)、《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暗算》(麦家)、《繁花》(金宇澄)、《推拿》(毕飞宇)等都存在持续修改和多次再版情况。当代文学文本修改其实既与传统典籍因时间久远和传播流散造成版本差异不同,也与现代文学受政治环境影响而出现伪装本、删节本有别,影响当代作家作品修改与再版的动因更为复杂和多元,除传统类似因素影响外,主要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精益求精的创作手艺。对成熟作家而言,小说出版绝非创作终点,“再创作”的修改常是实践其艺术追求的延续。这种动力源于对创作理念的反思,以及艺术水准的精进。张扬时隔数十年重改《第二次握手》,在保留初版情节框架基础上,重点深化苏凤麒等的人性深度,让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张洁为《沉重的翅膀》修订本走访取材,主动重塑情节与人物的,贴合艺术完善需求;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多版本迭代中反复修订,只为实现作品艺术完整性;金宇澄则从字词润色到历

作家为何修改已面世的小说?

——兼论小说版本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罗先海

作家的修改行为赋予了作品不息的生命力,而版本研究则是对这种隐藏的作品生命历程的考古与探寻。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也构成其自身的“微缩文学史”,这启示着我们应该放下定本执念,以一种动态、开放和历史的目光看待文学及文学史,“小说版本学”也由此成为通往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文学世界的可能路径



小说版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曾说:“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中,各种版本的编辑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每一版本,都可算是一个满载学识的仓库,可作为有关一个作家的所有知识的手册。”作品的版本演进不仅涉及物质形态改变,更内蕴着丰富的内涵与意义。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多以“定本”为核心,版本差异常被视为“次要信息”。但实际上,版本研究不仅能还原作家如何创作及修改的隐秘过程,更为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揭示文学经典的动态生成。传统的文本解读,往往聚焦于某一版本或所谓定本的主题、人物、结构、叙事等,容易忽略文本变迁过程中蕴含的“意义生成”,以版本视角切入小说研究,恰能打破视文学经典为“天生如此”的静态神话。《小说变形记》通过呈现一部部作品如何从酝酿、雏形、手稿、初刊、初版到多次修订的文本序列与完整链条,生动地呈现出《沉重的翅膀》《活着》《一个人的战争》《暗算》《繁花》等小说名作如何在不断打磨、调整甚至争论过程中的动态生成与成长。作家的修改,既是某个时期最鲜活和最敏感的文学习表达,又能让作品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语境,从而持续进入文学史视野。文学作品存在动态生成的现象,也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某种可能和启示。因文学史家版本意识的缺位,传统文学史写作长期依赖于对作品通行本或定本的描述,从而遮蔽了作品版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既然文学作品本身存在动态的版本变迁史,文学史就应叙述而不能忽略并掩埋这种“史”,从而为重构丰富立体的文学史图景奠定基础。

还原小说修改的隐秘过程。小说家的创作及修改过程,往往因手稿流失、记忆模糊或作家、编者秘而不宣等原因而成为一种“文学传说”,版本路径则是进入作家“创作实验室”的一把有效钥匙。版本研究需要对作品诞生进行文本发生学考察,既要借助日记、书信、创作谈等一手文献,追溯小说的创作动机、灵感来源,也要通过比对汇校小说手稿、初刊本、初版本、修订版等不同形态的文本,结合编辑审稿意见、作品出版档案等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实证性地还原小说创作及修改过程的关键细节。《小说变形记》针对一系列小说名作进行版本研究,试图通过细致汇校同一作品不同版本在内容上的增、删、改、调细节,勾勒出小说家艺术创造的演进脉络,深入挖掘小说修改

过程中的隐秘环节:从文字调整背后的情感波动,到情节增删中的策略考量,最终尽可能还原出一份关于作家精神世界与艺术探索的连续“心电图”,让小说修改的隐秘过程不再是模糊的“文学传说”,而是可感可知的实证存在。

开辟文学批评与理论阐释的新维度。当作品因各种原因衍生出众多修改本后,在历史化文学批评语境中,“版本笼统所指”“版本互串”等问题就会严重削弱文学批评与阐释研究的严谨性。在批评实践中,版本不同会导致批评指向与结论的分野——即针对初版本的批评未必适用于改定本。可见,面对作品存在多版本的现象,批评家和研究者必须首先解决“以何为本”的核心问题——唯有明确批评所依托的具体版本,才能避免将某一版本的阅读印象强加于另一版本,确保批评和研究结论的精准性。批评家和研究者版本意识的确立,恰好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关键路径。它或可推动文学批评跳出以往单一、固化的文本阐释框架。这一转向的核心,是对两方面内容形成自觉反思:一是文本流动性,即版本演变中文本内容的增删改调;二是阐释历史性,即不同历史阶段版本对应的批评语境。这种转向不仅挑战了以单一版本统摄作品所有阐释可能的绝对权威,更能引导思考不同版本因文本内蕴差异而支撑的多元阐释方向。

小说版本研究的路径方法

在新的文学语境中,小说版本研究的路径与方法,需打破单一研究范畴的局限,实现偏史料考据的“版本学”与偏深度阐释的“文本学”的有机融合。可沿目录、校勘、阐释三个递进维度逐步推进,构建兼具文献扎实性与学理深度的研究框架。

构建版本谱系的清晰脉络。借用传统目录学方法,全面经眼并搜集小说版本实物,确保所研究的作品众本具备,涵盖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修订本、定本等,有可能的话甚至还要纳入删节本、盗印本等特殊版本,避免遗漏关键版本信息。要严格鉴别版本差异,聚焦作家、编辑、出版者等“复数作者”修改导致的文本变异,筛选正文本或副文本有显著差异的版本进入研究范围,保证研究对象的有效性。《小说变形记》一书也详细编制了新时期小说的版本谱系,结合书目查询与实物研究,分析版权页、序跋、修改说明等信息,绘制出新时期小说版本变迁谱系目录,尽可能清晰呈现版本源流。

如果作家、编者仍旧健在,可以通过相应的访谈调查,深入了解作家修改已面世小说的原

因、修改的内容等信息,为版本差异研究提供可依依据。

建立异文资料的完整库藏。融合传统与西方现代校勘学方法,并结合小说版本修改及演变实际情况,以汇校版本异文为核心,通过科学整理与分类,形成可以共享的版本异文研究文献,为文本分析提供支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优先整理出版汇校本,将不同版本异文系统汇校,若受版权限制无法出版,则应以校读记形式整理保存异文。如《小说变形记》中针对《白鹿原》《活着》等作品就完成了初刊本、初版本、修订本等多版本对校记。还要分类固化汇校成果,按“实质性异文”与“非实质性异文”对校读记内容分类,集成“小说版本修改异文资料汇编”,构建完整的异文资料库。同时,还要保障资料公开共享,通过规范的异文整理,为作家研究、作品再解读提供公开的文本文献,解决学界版本研究文献不足的问题。

挖掘文本演变的深层逻辑。引入文本阐释学的方法,联通版本与文本视域,从多维度解析版本变迁背后的文本规律与学术价值,实现从资料整理到学理研究的跨越。解析版本与文本的关系,明确小说不同版本其实就对应着不同文本,与古书“同本异文”有别,从而为文本解读提供精准版本依据。聚焦文本与变本的关系,以“变本”(主动或被动修改正、副文本形成的异本)为核心,重点研究小说文本修改问题,厘清原文本与修改型变本的变异关联。梳理正文本与副文本的关系,关注版本变迁中封面、插图、注释等副文本改动,挖掘副文本隐含的关键信息和阐释空间,把握其对正文本阐释的辅助作用。探究版本变迁与经典化的关系,将版本演变视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环节,通过版本研究确认佳作、拯救名作,拓展经典化研究路径。分析异文对文本的影响,研究异文形成原因,以及异文对文本语义系统、艺术系统、文本本性的改变,明确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应秉持“叙众本”的原则。

总而言之,作家的修改行为赋予了作品不息的生命力,而版本研究则是对这种隐藏的作品生命历程的考古与探寻。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也构成其自身的“微缩文学史”,这启示着我们应该放下定本执念,以一种动态、开放和历史的目光看待文学及文学史,“小说版本学”也由此成为通往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文学世界的可能路径。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文学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作异文汇校与文本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2FZWBI06)研究成果]

短 评

李育善是知名散文家。他出生于陕西丹凤县棣花镇,是贾平凹地道的同乡。李育善先后出版过《李育善散文集》《山里的事》《惊蛰之后》《走过丹江》等,获过柳青文学新人奖和柳青文学奖。许多年前,我曾以《好山好水好乡亲》为题撰文评过他的散文集《山里的事》。他的《商山草医录》,是一部长篇纪实散文,写的还是山里的事。或者说,李育善和秦岭确有不解之缘,他是一个深爱秦岭的“大山里的作家”。

我曾说李育善的《山里的事》写的是“好人好事好乡亲”,而这部《商山草医录》则可以看作是《山里的事》的“升级版”。他写的不仅是“好人好事好乡亲”,而且是山里有“一技之长”或有深厚民间文化背景的“中草药医人”“中药采药人”“中药炮制人”等。书中有“穿越时空的王家成”“他说王家成”“我遇见的乡间草医人”“我遇见的山里采药人”“商山里的中草药”等10余部分,聚焦这中间人物群体,作者对商山洛水大地上的这民间草医人、中医人和采药人等70多人进行了随机采访,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生活的前世今生,记录了他们在民间行走和寻药治病的经历。这些人 是秦岭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秦岭的魂魄。李育善发现了这些人,就发现了秦岭之魂。或者说有了这些人,秦岭才更加巍峨,更加生动,更加深不可测。

书中详细介绍了商山地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用鲜活、生动的文字描摹草药的特色和风情,记录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其中,王家成大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想要采访他时,他已去世多年,于是作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访谈当年与他有过深度接触的人,将书面记载与实地采访相结合,让王家成的形象“重新复活”。作者还采用“魔幻”手法,让王家成以“自述”方式讲述自己一生采药行医的故事,呈现了他早年艰难的学医过程和传奇的救治疑难杂症的往事。他“看病是我的本分,一不收钱,二不要礼”的高尚人格分外令人感动。外号“张木匠”的骨科名家张青华大夫,虽然是中医院的副院长,但为了保证疗效,坚持亲自采药,把

秦岭之魂的发现者

——评李育善散文集《商山草医录》

□孟繁华

李育善和几个同行朋友历时四年,采访了诸多行医者和采药人。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其中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除了作品主体部分之外,《中草药里的文学》是我最感兴趣也最为感佩的。这一部分彰显了李育善的文学修养以及他对中草药和文学关系的熟知。《西游记》《红楼梦》《诗经》《楚辞》以及诸多和文学有关的或相结合的作品如《本草诗笺》《药名诗歌》《药名闺情诗》等等,作者几乎信手拈来,这是李育善写作这本书的暗功夫,也是真功夫。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底,要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李育善创作的题材和取材资源范畴,都处于“边缘地带”。在当代文学视野中,“边缘文化”常因远离主流叙事而面临被遮蔽的困境,但在基层生活的作家贴近生活、直面生活,他们不仅是“边缘文化”的发现者,而且是激活边缘文化的重要载体。他用直白、朴素的语言还原了草医、采药者的日常生活,无论是90岁老草医背着药篓蹒跚独行的坚韧身影,还是30岁年轻草医记录偏方时的敬畏神态,抑或患者因草药痊愈后质朴的感激之情,作者都没有夸张地抒情,他的质朴恰如秦岭般沉静冲淡。同时,书中收录的100多剂方、偏方,并非以晦涩的专业术语呈现,而是附着在“治咳嗽用枇杷叶配生姜”“止腹泻用马齿苋煮水”等生活化场景中,让原本属于“小众知识”的草药文化,成为大众可感知、可理解的内容,真正实现了新大众文艺的旨归。另一方面,《商山草医录》对“无名大众”的深情关注,把草医、采药人从大山深处拉到了生活的前台。这些人没有响亮的头衔,更不是医学权威,也非文化名人,但在这本书中,他们的举手投足都被如实记录,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民大众,他们是弥漫在深山里

的秦岭之魂。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声 音

抗战诗词总是常读常新

——《抗战诗词三百首》编后感言

□周兴陆

十四年的抗战,是直接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一切的人力、物力、财力被充分调动,思想、意识、精神被广泛凝聚,服务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决定国家命运的抗战。同样,文学作为宣扬正义、动员思想、激发精神、团结同道、抨击侵略的利器,也自觉投入抗战大潮中,形成了蓬勃发展、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学。在五卅文学革命的冲击下一度式微的旧体诗词,在抗战的特定时代环境中,找到了用武之地。诗词创作者们积极响应时代号召,调整诗歌创作方向,表现时代主题,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今年选编《抗战诗词三百首》,正是为了系统呈现抗战诗词创作的成就,向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致敬。这些抗战诗词,既秉承传统边塞诗、战争诗的爱国主旨、豪壮风貌,又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表现出新的思想内涵和新的精神气象。这些抗战诗词与其他抗战文学形式一样,是抗战时代的最强音。

抗战诗词饱含的是守卫疆土、维护正义、抗击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诗词表现时代生活、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呈现出雄浑悲壮、高扬豪迈的创作风格。即使是抗战中记述失利、批评时局、哀悼逝者等情绪较为低沉的作品,也并不悲观颓唐,而是在痛心疾首的同时,表达继承烈士遗志、争取抗战胜利的坚定决心。正是这样的文学,才真正能发挥鼓舞人心、激发斗志、震慑敌人、鞭答罪恶的力量。

抗战诗词在形式上的革新也很明显,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长篇叙事诗大量涌现。这一现象源于诗人对叙事性的强化需求——通过扩大文本容量,以便更自由、更充分地叙写抗战事件、表现抗战精神。很多作品紧密关注现实、反映时事,甚至有些作品像战地通讯一样,及时报道前线的最新消息。很多诗人采用古风、歌行的形式,或长或短,形式灵活自由,不用典故和偏僻字,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比如长句短句交替运用,音韵铿锵、节奏明快,多可配乐歌唱。

这些诗词的作者构成非常多元。有的诗人本身就是 在抗敌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将士,如朱德、陈毅等将领。有的诗人曾经亲赴前线目睹军人的英勇、战争的惨烈。比如,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郭沫若曾赴昆山前线;田汉多次前往前线慰劳战士;1939年7月,老舍也曾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探访北方战场将士。置身于抗战的现实境遇之中,很多人写过抗战诗词,比如何香凝曾组织后方妇女织寒衣送前线,写有《寒衣曲》;冰心曾深入前线,创作了多篇抗战诗词,其《抗战日记》亦影响甚众;陈家庆经过淞沪战场,

写下《扬州慢·过上海闸北》。

可能有读者会问,在今天和平建设的时代,抗战诗词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在我看来,抗战诗词展现了坚强不屈的意志、英雄主义的气概、忧时忧民的胸襟、忠诚奉献的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这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思想启迪、精神熏陶、人格形塑和理想信念培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抗战诗词所蕴含的抗战精神、爱国情怀,在和平年代具有重要的转化价值。它不仅可内化为社会个体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甘于奉献、团结奋进的思想道德情操,更能外化为提升国民整体素养、助推国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抗战诗词中精神力量的生成,根植于爱与恨的辩证统一。爱是精神的正向维度,即对祖国的深情眷恋、对同胞的深切关怀、对生命价值的珍视、对正义原则的坚守,以及对和平的坚定信念。恨则是精神内核的批判维度,指向对侵略行径的憎恶、对挑衅者的蔑视和对强权暴力及邪恶势力的坚决斗争。抗战诗词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铭记历史并非要铭记仇恨、延续对立,更非引发新的冲突。铭记历史,在于传承抗战诗词中爱正义、护和平的精神内核,以历史经验凝聚社会共识,为捍卫和平提供长久的精神支撑。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